

PHOENIX WEEKLY

DEC 2012 | 第36期 總第457期

鳳凰週刊

1942

真相

那一年的中國
有着不為大眾所知的
另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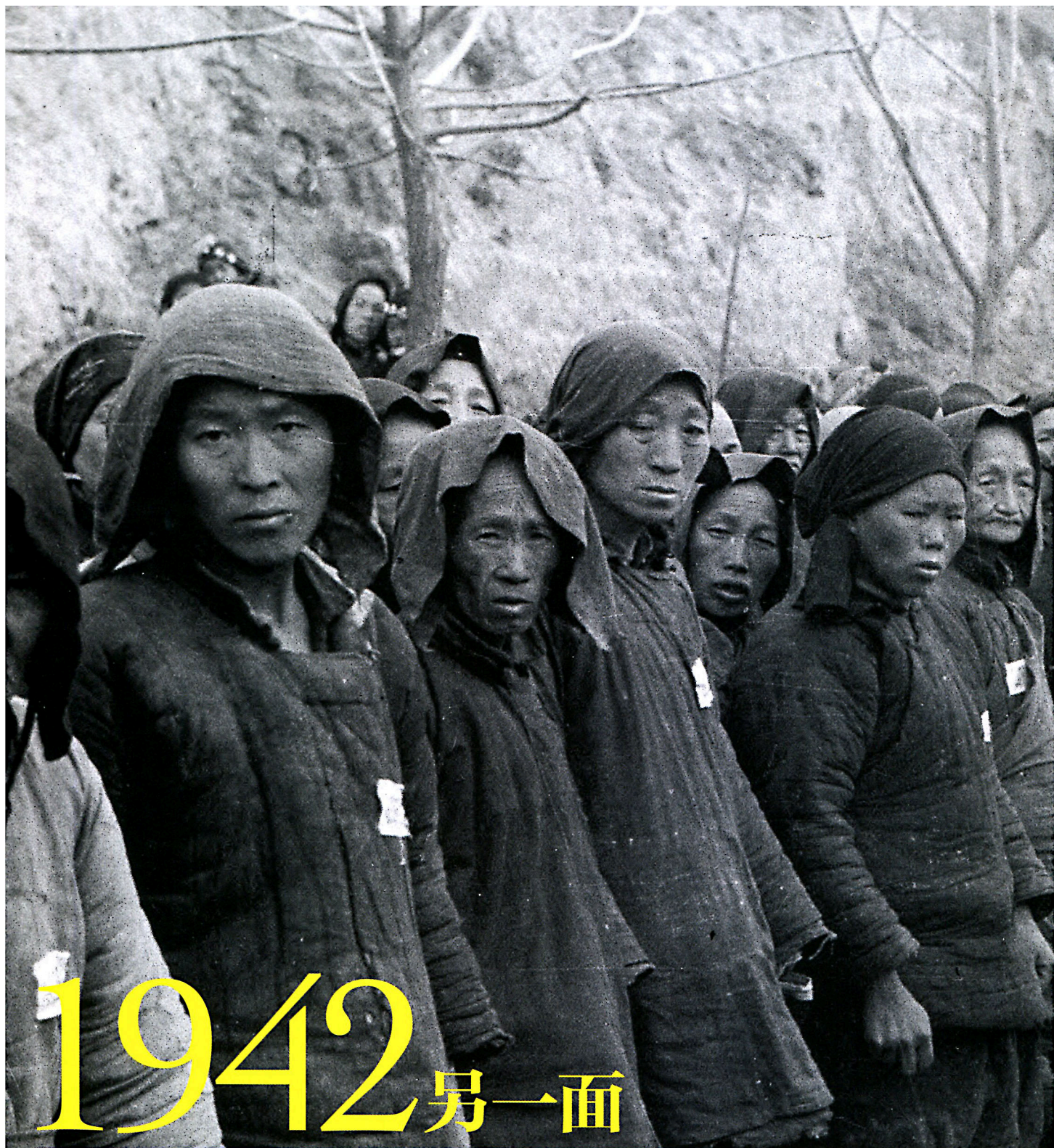


中國內地 RMB 15.00元 港澳地區 HKD 25.00元

Independent Thinking for Chinese All over the World.

本刊獲特許在中國內地發售

「為全球華人提供獨立意見」



1942 另一面

近日，冯小刚根据刘震云的报告文学作品《温故1942》改编的电影《1942》上映，完成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引起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和热议。“温故知丑，以史为鉴”，是媒体替冯小刚总结出来的拍片宗旨。

其实，电影面世前，来自这本报告文学的颇多“段子”多年来已常被人们提及和引用，譬如“日军开进刘震云家乡放粮救灾”“这次灾荒导致中国政府大失人心，后来的河南会战中日本仅用六万军队，就歼灭了三十万中国军队”“五万中国军队被河南农民缴械”……随着段子传播越来越广，它们倒像是其来源与真实性无需检验的史料一样，经常被媒体引用和发挥，甚至依此构建出某些价值体系。文艺作品不妨虚构，不过，打着“以史为鉴”的旗号，还是需要做经得起检验的考据。



本刊为此请多位相关领域的长期研究者，各展其长，根据有据可查的史料试图重构这场大灾。诚如电影所言，国民政府当时的确存在反应迟缓及贪腐现象，但事实的另一面同样需要被了解，包括当时并存于河南的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冲击，包括灾年中国的抗战实况及其对大灾的影响，包括灾情披露及救灾过程的真实经过，也包括电影及文学素材提供者——美国人白修德书写历史的全过程。

在多位国内著名民国史研究者眼中，这场大灾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当年的中国有远不为大众所知的另一面。而“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讨的另一话题。

温故豫灾1942

特约撰稿员 / 黄道炫 唐元鹏 文亮

1942年，无论地缘政治、对日战争还是国内政局，无疑是令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大哀大喜、交相起伏的一年。

前一年，皖南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国民政府和中共表面上的团结已难以为继。

至1942年，中国沿海地区和大部分产粮区早被日军占领，财税基地丧失过半。海外贸易断绝，军队的弹药武器和军用物资奇缺。伴随战争而来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情形不断恶化，国家财政已到濒临崩溃境地。

1940年，因日军进攻越南，中国陆上补给交通线——桂越线中断。1942年5月日军攻入缅甸，最后一条陆上补给线——滇缅线也中断，日本完成对华军事战略包围。

苏联为避免两线作战，抗战前曾同意资助中国对日作战，但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方承认日占中国东北地区为“满洲国”，日本承认苏占蒙古，随后苏援断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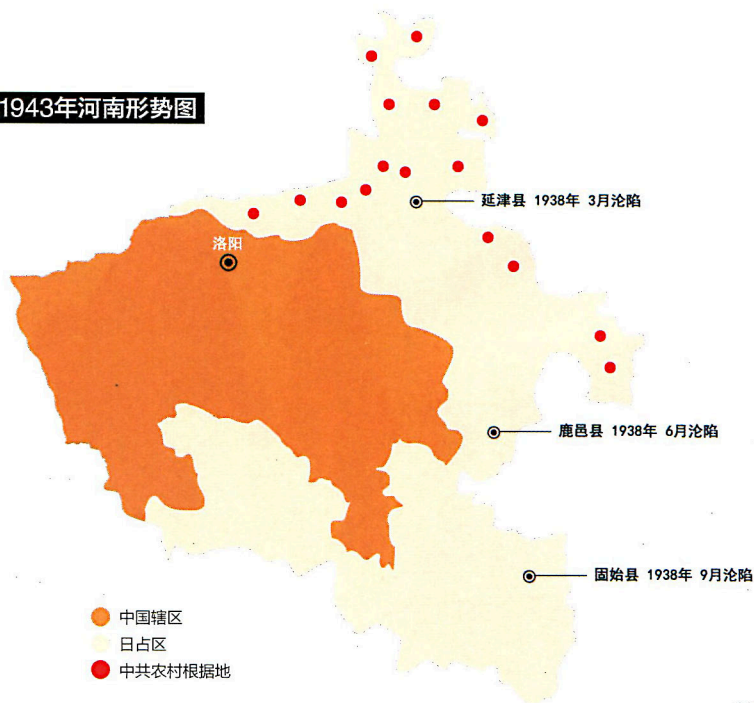
……

就在这样内外极度交困的环境中，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战第五个年头。所幸1941年12月爆发太平洋战争，美国全面介入二战，蒋介石的“苦撑待变”战略等来结果。可是美国援助中国抗战需要交通线，海陆交通已被堵死，物资根本运不进来，仅靠中美开辟的“驼峰航线”空中运输，对整个中国抗战局势仅是杯水车薪。

就在这一年，作为抗战前线（战区）的河南省迎来抗战最惨烈的时期。连续两年全境旱、涝、蝗灾不绝，波及到冀南、晋东南、鲁西地区，1942年中后期，灾情恶化至极点。

河南当时处于日占区、国统区、中共根据地三种力量犬牙交错的状态，三方地盘皆经受了这次大灾的冲击。

1942—1943年河南形势图



制图 文亮

战争中的特大旱灾

河南地界，属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气候，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高压（干、冷）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湿、暖）的季节性位移，造成河南气候多变，骤涝长旱特征明显，自古就是水旱灾多发的省份。

自公元1279~1911年的600余年间，河南曾出现过旱88年，平均6~7年一遇，大涝69年，平均8~9年一遇。公元1001~1948年共发生蝗害215次，平均每4年多就有一次蝗害发生；而1913~1948年间共有35年发生蝗灾，几乎每年都有蝗灾记载，其中重大蝗灾即有8次。

从明末到民国300年间，河南发生的三次特大旱灾对人口与经济造成严重损失。明崇祯十至十四年（1637~1641年）大旱，延续时间长、范围广，灾民“以树皮、白土、雁屎

充饥，以柿蒂、蒺藜、牛马为食，骨肉相食，死者相继，村舍十室九空”。

清光绪二至四年（1876~1878）大旱，全省87个厅、州、县报灾，“赤地千里，人犬相食”，饿死者近200万人。

民国时期的38年中，河南全省出现大旱、特大旱灾8次，1942年大旱尤为严重。

根据当时气象资料统计，这一年河南全省降水量较正常年份偏少4~6成。临汝、禹县、界首诸县降水量只及常年平均值47%、58%、41%。1942年大旱始自1941年，至1942发展至高潮，全省受害县份就达74个，为历史所罕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称其为“光绪皇帝以来最严重的旱灾”。

1943年秋，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在《河南省灾情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这次旱灾“以第一、第五两行政区所辖各县最重，第六、第七、第十等行政区所辖各县



将树皮捣碎充饥的家庭

粮食吃光后，饥饿的人们就剥树皮磨粉充饥，特别是榆树皮都被剥净。此外，他们的食物还有观音土与雁羹。

次之。第一行政区以广武、郑州、尉氏、长葛、禹县等5县最重，密县、汜水、新郑、中牟、洧川、荥阳等6县次之。第五行政区以许昌、临颍、鄢陵、襄城县等4县最重，鄢城、宝丰、郟县、临汝、鲁山等5县次之”，在其统计的5个行政区29个县中，死亡人数共148万余人。

《新华日报》给出的数据是：“是年大旱，遍及河南全省，全年收成不及十之一二，人民饥饿而死者约计在150万以上，逃荒者约在300万以上。”

这些数字应该都是不完全统计，确切的死亡人数因为当时河南三种力量并存的状态，难以得到。至1938年底，河南大半县市已在日军的占领之下，作家刘震云的故乡延津县所在的第四行政区，1938年3月已属于日占区。据粗略统计，至1943年底，有63县沦陷，全省战场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白修德估计的全省有300万左右的人饿死，后来

被广泛引用。

抗战时期，日军占据河南北部的安阳、南部的信阳以及东部开封等地，分别扼住了河南通往日军占领的基本区域河北、武汉、济南等地的咽喉。

据中共根据地的记载：1942年后，大批灾民离家逃荒，日军为防止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灾民进入其占领区，影响控制稳定，采取封锁政策，灾民无法向日占区或经日占区向外流动。同时，日军为应对灾荒，还将灾民往大后方、敌后根据地驱赶，当时，被驱赶逃荒进入国共控制区域的灾民不下300万人，进一步加大了这两个区域的救灾压力。

不过，对日占区内部在灾荒时的详情，目前仍缺乏深入研究。虽然有相关研究者在日文网站上看到来源不详地粗略提及日占区内有过放粮救灾举动，但在除此之外的1942年日文相关文件中并未再见到日军发军粮一说。中文资料中，伪新河南日报社社长、

伪河南省宣传处长及省新民会事务部长邢汉三所著的《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中，对日占区的赈灾治蝗举措有过相对详细的记载。但在国内研究者对其的评述中，这些举措被认为是收效甚微的。

如果刘震云对家乡的记载属实，倒是可以由此一窥日占区（沦陷区）灾民的惨况——只不过在报告文学和电影中，他家乡的日占区背景被误认为国统区。

无论赈灾状况为何，在当时的中国，为支持战争，无论是大后方还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因战事所需无一不加强了对民间的征发。抗战时期，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生产都出现大幅度下降，根由就在于战争带来的破坏和过度征发。河南处于对日抵抗的前方，常常遭遇日军的“扫荡”和骚扰，人民负

担更加沉重，粮食征发仅次于四川，在全国居第二位。可以想象当灾荒到来时，失去抵御能力的人们会以多快的速度陷于饥馑。

灾情披露

灾荒发生后，国民政府对灾情预计不足，反应的确迟缓。

1942年初刚刚上任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虽然向中央政府报告了河南灾情，但并未积极申请减免税赋，反而要求授予镇压“奸佞匪盗闹事”的紧急处分权。

河南属于第一战区，战区司令蒋鼎文不是地方官，但越俎代庖，向中央政府陈情并指责地方官轻报灾情、救灾不力。但在刘震云的作品与冯小刚的电影中，蒋鼎文与李培基二人的历史角色和真实表现可以说是完全弄颠倒了。

当时，除了蒋鼎文，河南前省主席刘镇华亦联合众多名流上书中央，要求赈灾。

根据报告文学及电影里的说法，灾害消息被严密封锁，直到白修德1943年3月在《时代》周刊登载了豫灾报道后，才引起中外关注，展开救灾行动。不过，更为客观的表述应是：白修德的报道，以外电的影响力推动中外更加重视灾情，向官方施加了更大压力，无疑在推动救助活动扩大规模方面有功劳，但要说是他突破封锁把灾情捅破才导致救灾不符合事实。

首先，白修德赴河南战区采访，也是获

得了军方新闻审查机构的批准才能成行。

其次，白修德也是在看到中国国内报道、听到记者朋友的说法以后，才于1943年2月底赴河南采访的。1942年9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的消息，1942年12月28日，《大公报》登载了记者王工碧的《河南灾荒目睹记》，总编辑王芸生还配发了长篇社论。至1943年2月1日，《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豫灾实录》登载，再次披露河南大灾中的惨烈状况，第二天王芸生发表了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长篇社论。

《大公报》这次遭到停刊三日的处罚，倒不是因报道灾荒和呼吁赈灾，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的处罚理由是“攻击救灾弱点和战时限价政策”，认为有打击抗战民心士气之嫌。同年底，军委会新闻检查局给出关于灾荒报道的注意事项——不得过度渲染，但对救灾和捐款等呼吁方面的报道一律给予放行。

值得一提的是，军事新闻审查部门的处置是否妥当暂且不论，但此事后来在传播和引用中被无限延伸和放大，甚至成为不准报道灾荒的铁证。其实在那个年代，军事新闻审查制度并不是国民政府的发明。自一战开始，欧美国家除了实行战时统制经济，还实行了军事（战地）新闻审查制度，涉及军事、战区甚至能影响战争全局的新闻报道均要送审，其目的是要信息必须服务于战争

全局。

二战中，美国参战以后，罗斯福总统于1941年签署8985号行政命令，成立审查办公室，任命美联社资深记者拜伦·普雷斯担任主管，负责全美军事新闻、邮件、电讯的审查。美国记者基本都配合了国家的军事新闻制度，鲜少有违反案例。

但中、英、美的这种战时军事新闻审查制度，执行得都不算严格，针贬时弊、抨击政府和官员的报道在抗战时的媒体上随处可见。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记者和撰稿人大量涌入中国，其实很多记者并不遵守中国的战时新闻审查制度，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后来的越战时期的南越。

时至1942年8月，全国大小报刊，各界人士已不断发出河南灾区惨相的报道，呼吁政府速加救济。

1943年3月，自灾区采访归来后，白修德未将稿件送交军事新闻审查机构过目，就通过电报局将稿子发往美国。他在自传中介绍：这位帮他发稿的电报员后来也遭到了处罚。其实，个中原因就是电报员违犯了军事新闻电检法令。

白修德的新闻报道风格属于“幻象派”，类似于当时的美式报告文学，用他的话说，夸张是一种常用的手法。但他对灾区惨状的描述，从后来国民政府和中共根据地的救灾报告来看，虽有文学笔法，基本事实似无太多出入。

电影1942八大历史硬伤



1 电影里，1942年秋冬时分，张国立饰演的范财主，派长工到县里搬救兵，但遇到日军被迫返回。实际上延津县1938年春季已沦陷敌手，范家财主搬的是哪个“救兵”？

2 电影里讲述了刘震云老家延津饥民拉家带口，赶车牵驴去逃荒的故事。但延津县在黄河以北，洛阳在

黄河以南，当时郑州的黄河大铁桥已经在1938年2月因为战争炸毁。乡亲们逃荒，如何赶着牲口大车，拉着小车，蹚过黄河走到洛阳？

3 电影里讲蒋介石因为河南失陷而被排除出开罗会议。实际上豫湘桂会战是1944年4月开始，日军占领洛阳为1944年5月，但开罗会议

是1943年11月举行，两个时间对接不上。

4 电影里讲1942年到1943年某个时间段，中国军队打了豫北会战。历史上在抗战相关年份，只有1941年5月有过晋南会战（即中条山会战），1944年4月有过豫中会战（豫湘桂会战一部分）。

饥荒中吃树皮的方法

美国记者福尔曼拍摄的豫灾系列作品广为流传，有些却遭到“摆拍”的质疑。以此图为例，直接抱着树干啃树皮的“造型”被怀疑是记者对饥荒缺乏常识而设计的摆拍。白修德的自传《探索历史》中的说法符合实情：“他们从爱好树木的军阀吴佩孚栽种的榆树上剥下树皮，因为榆树皮磨成粉可以充饥。”

而白修德文章的延展性报道、评论、总结，则存在着颇多事实、通识和结论的错误，缺乏专业性和平衡性，而这些材料一再被误引误用。

如他称西方国家能预报天气灾害，中国不能预报，暗指政府无能，其实发达国家也是到上世纪60年代有了气象卫星后才能较准确地预报气象。又如豫灾与后来河南会战的关系（大意为：中国政府被农民抛弃，站到日军一方，致使处于强弩之末的日军于1944年发起的豫湘桂会战，把国民党军队打得全线崩溃，一败涂地），被后世著文者反复引用，但这与事实基本不符（关于此战详情，见本专题文二）。

对灾害的应急以及政府救助的低效、无能、腐败的指责统统无可非议，这是所有前现代国家的通病。发达国家基本克服这些弊病也是在二战之后的事，但也从未躲过被抨击，何况当时的中国是处于战争绝境中的农业国家。白修德的灾区报道也因此被美国报业同行认为是不全面客观，带有浓烈政治倾向的。

政府的救灾与弊病

河南遭灾后，是否长期处于无人问津、孤立无援的境地？事实上，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及全社会，当时都采取了赈灾举措。

1942年8月，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派出专人赶赴重庆，向国民政府陈报灾情，省

民政厅也连电中央请拨专款赈灾。当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拨付约计2亿元左右用于赈灾。

紧急情况下甚至还有他款可以挪用，如第一战区长官部发还河南省的军事征用工料价款300万元，改用来赈灾。河南省政府方面，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命全省党政军各捐口粮一部分，给各乡镇设粥场。1943年春节，李培基亲往鲁山北关琴台广场召集老弱病残灾民排成南北队，每人发给30元。

当时的救灾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42年1月至10月间，调查灾情，拟订救灾计划与办法；第二阶段自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按已定计划分别实施，以赈款、赈粮、平果为主；第三阶段自1943年2月至6月，救灾工作最紧时期，以工赈、扶植生产为主，以乡镇为单位普设粥厂汤厂，大量配发救荒食品。

当时国民政府在救济灾民方面，采取了下列措施：

设立灾民收容所，帮助灾民迁徙，出境谋生。制订难民收容程序，一要接送政府组织疏散的难民；二要聚合、收容自发逃亡的难民。1943年前由收容所登记收容遣送的难民总数达10余万人。各县将确无生路的灾民编组登记，发放证明，遣送到邻省就食，其中赴陕灾民约32万，赴鄂灾民2.2万。

设立粥厂，查放余粮，发分赈谷。灾民面临急迫问题是饥饿，粥厂多设在灾民过往



居多的路口或铁路沿线。当时蒋介石令河南省政府于陇海铁路沿线重要地点设立粥厂救济灾民，总计各县共设立大小粥厂4000多处。

河南省通知各县所有大户存粮除应缴征实征购积谷、种子及自食外，应即一律予以查封，贷借灾民或令平价出售。《河南省各区查放余粮情形报告》提到，河南八区查放仓谷余粮数目总计达35万石。豫省曾三次开仓贷谷，其中第三次是在1943年3月春荒严重之际，河南省府当时令各县速将现存历年积谷合计33万石散发给灾民。

5片中旁白深情地说，1943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作家刘震云并不知道日本人对河南发动进攻只有两次，一次是1938年日军攻打中原占领了豫北、豫东；第二次是1944年日军打通平汉线占领河南大部。也就是说日军无论如何也不会在1943年开到他家乡救他的乡亲们。

6片中讲述省河南主席李培基觐见蒋介石，希望向他报告灾情，但蒋介石准备飞赴缅甸前线视察，同时身边侍从官给他汇报当日大事，其中讲到英军在缅甸被包围的仁安羌战斗。历史上，蒋介石飞赴缅甸是1942年3月1日，仁安羌战斗发生在1942年4月17日-19日。

7片中大致在1942年冬天，罗长官（大概是指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报告，缅甸前线日军用毒气弹袭击我军……但远征军1942年8月就全部撤出缅甸了，1942年底，在缅甸，中国军队除了散落的某些散兵游勇，无成建制兵力，那么这时和日本人打仗的“罗长官”到底是谁？

8片中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不肯减免军粮。事实却是，蒋鼎文在1942年秋天西安军事会议上，已经向蒋介石当面报告河南灾情，而且他据实报告比地方政府所报更加贴近实际情况。蒋介石正是参考了蒋鼎文报告，决定1942年在河南征收军粮从500万石减少到280万石。



河南灾荒期间乘坐火车逃荒的灾民

据《新华日报》数据，“饥饿而死者约计在150万以上，逃荒者约在300万以上。”然而当时各方得到的数字都是不完全统计，确切死亡及逃荒人数因为当时河南三种力量并存的状态难以得到。

其他方面的赈灾措施还有“办理平糶、举办工賑、发放农业贷款、节食救灾”。从陕、皖、鄂总共购进的平糶粮2405万斤，先后被拨交各运销站，配销各县。

当时奉蒋的命令，河南省各部队、团体搞起“一把米运动”，每人每日节约一小匙米，以济灾民。驻河南军队则有节食救灾举措，三月为期，1942年12月份开始节食，各部队节食省出来的小麦共300万斤用于赈灾。

紧急情况下，军粮调拨赈灾也有发生，河南省粮政局与第一战区兵站总监部及各县平糶委员会拟定军粮调拨办法，分别发放鲁山、南召等六县，共计拨借35000包，供灾民食用。

当时，各层级政府官员在赈灾中低效、

无能、腐败的现象确实如电影所说，屡见不鲜。蒋介石1943年4月的两篇日记中记录了对官员办事潦草的责备，以及对灾情惨烈的感慨：“郑州沿途浅葬暴骨为狗所食之惨状，严电蒋、汤。又，郑州专员与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乎！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若再延长一年之后，则中国万难支持，势必受无穷羞耻，不能完成上帝赋予之使命。奈何！苍天，上帝速救我危亡乎！”

除此之外，作为前线的河南，在抗战期间的负担仅次于大后方的四川，这也是事实。以对灾民切身相关的征粮为例，1941年，在河南征收粮食总额为493万石。1942年，考虑到河南灾情，配征额减至250万石，减免约近50%，对于收成只及常年三成的灾区来说，负担仍属太重；而当年实征收额为311万余石，实际减免额为36%。1941年全省征收省级公粮40万石，1942年不但未见减少，反而增加到60万石。

关于这个问题，后世有诸多批评，不过却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背景：东南沿海一带本是占中国政府财政收入90%的关税、盐税、统税的主要来源地，自1940年代初沦陷后，当局财政收入急剧下降。若要坚持抗战，钱粮是首要条件，扩大财源和保证军粮根本为急需问题。

此时的中国只有农业资源可挖掘，粮食兼具解决财政和军粮问题的双重属性，1940年之后的“征粮”涵义已不同于此前的“征粮”。在“三税”急降大半后，国民政府以粮食“三征”（征实、征购、征借）的举措补偿财政，由于每年所得超过同期政府税收的3倍多，所以有人干脆称征粮实为抗战后期的“单一税源”，或称抗战财政为“粮食财政”也毫不为过。毫不夸张地说，不征粮，抗战即死。

在当时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同样面临这个严峻的难题。

1942年,中国整个财政收入是52.68亿元左右,政府筹集的近2亿元救灾款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3.8%。

中共根据地的救灾与困难

河南大旱,中共控制的晋冀鲁豫地区被广泛波及,也遭受惨重损失。对此,中共文件多有反映,可以透视出大旱之一斑。

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分为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行政区,在这次大灾中无一幸免,普遍歉收,受灾严重地区收成只有三四成,最严重地区绝收。

曾任中共冀鲁豫行署副主任的徐达本在一封信中描述:“现在灾民的生活,能吃糠、花生、稻子、棉籽物都算有办法,而其大部是三天二天的不开锅不动烟火。一部分人对生活不感兴趣,尽想死的办法:有的全家睡到炕上不起,等饿死在炕上,有自己烧死的,有自己挖坑等着死了有地方安息的。”

当时中共报告多次用“罕见”形容这次天灾,冀南地委在总结中写道:“特别严重的是去年与前年的灾荒给我们困难更大,估计两年死亡人口二三十万,畜力外流,重灾区几乎完全没有牲口。”(《中共冀南区党委对于地委书记联席会议的总结》《冀南历史文献选编》,P474页)

中共冀南行署主任的宋任穷在1943年底的报告中提到:“在重灾下人口死亡占总数的5%,特种灾区更加严重,企之县二区14000人,死亡2500人,占17%;广丘县死亡14%,四区死亡32%;东和固1772人,死亡542人,占42%强;又企之县七村7500人,死亡700人。不是全被饿死,而大部是病死。人口之整个减少重者占70%,牲口之减少重灾区占90%以上。”(《冀南游击战争的坚持与灾荒问题》《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下,P160页)

部队夜间走入重灾区时,就如进入了死城,所能听到唯一有些生气的声息,就是自己的脚步声。几乎所有村庄和房屋都寂无一人。推门进去,只见野草丛生,一片荒芜,

各种家具,如桌椅板凳橱柜等,都凌乱不堪地弃置着,说明主人曾经想把他们拿去变卖,但后来已无力移动放回原处。

在家具旁边往往就是倒毙的尸体,这些人正是从事某种活动时,比如挪动一件家具或正迈出房门,就地死去的。有些人则忍受不了这种苦难上吊自杀。因为无人善后,尸体还挂在房梁或者院中的树上,黑黢黢的,甚是恐怖。

在重灾区,很少能碰到什么活的生物,只有老鼠例外。夜间行军时,常常会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灰褐色的东西,如波浪一般滚滚移动,那便是转移就食的老鼠群。(《一个根据地的成长》P163-164)。

这些不是电影《生化危机》里的镜头,而是中共根据地文件档案里信手拈来的片段,可见灾荒之惨烈。

据统计,晋冀鲁豫根据地因为此次大灾,受灾群众达到150万~160万人,饿死或因灾而死的人数在35万~45万之间,逃荒者百万以上,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受灾群众非死即逃。

面对如此大灾,中共根据地也进行了相应的救灾措施。

最早的措施是抢种,1942年的旱灾在春季已经出现,7月份,八路军各部队根据野战政治部的紧急训令,帮助群众补种杂粮,抢种蔬菜。7月中旬,太行北部地区下暴雨,当地党政军民抢救了一批禾苗,补种了一批杂粮和蔬菜。

1942年秋收后才有了首度直接应对灾害的措施——免粮,给五、六两专区减免公粮45000石。1943年麦收时,又给一、五、六专区减免公粮15500石。而至大灾之势已成的1942年10月,拨出过须偿还的无息贷款10万元给灾民。

除了急赈和低利、无利借贷粮款之外,以工代赈是根据地救济灾民的主要手段之一。边区政府提出“救灾不救懒汉”的口号,

希望通过自救和耕种抢种渡过灾荒年。

抗战期间,不管对哪方来说,粮食都是军事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实际上哪方都无法过多减免。由于面对一场多年罕见的战时天灾,中共的文件也指出,根据地救灾亦存在诸多困难与不足。

太行区的救灾工作口号是“不饿死一个人”,但减免公粮所占比例仍不高,1942年该区减免公粮5.6万余石,征收公粮为58.8万石(《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P172、《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P356)。

在屯粮方面,从1942年11月起至1943年10月底,除了减免五、六专区5.35万石之外,实屯数达到原概算96.5%。(“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1943年9月12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52)。除了重灾区之外,其他地区如受灾的一、四专区并没有减轻负担。就算受灾严重的五分区,减免幅度仍然微乎其微,1942年每人平均负担一斗六升,1943年每人仍然要负担一斗五升,每人只减轻约6%(《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三》P105)。

《一年来太行区财政工作》报告承认,“1942年度的征收工作,成绩甚好,是空前的一年,不只完成计划,而且超过任务额,打破了几年来的征收纪录。”

自身就已自顾不暇,外来灾民更加重了根据地负担。仅在1943年1月,据不完全统计,太行区外来灾民已达2万以上;左权、和东及太南数县安置外来灾民就有6000余人。根据地政府设置招待站,招待过往灾民食宿,命令各县按当地居民3%的标准进行安插,借给他们食物和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并对无办法生活者实施赈济。(“太行区1942、43两年的救灾总结”——《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二》P140-141)

但接纳能力有限,灾民过安置过多,亦会影响到根据地存亡。1943年1月30日颁布的《根据地外来灾民登记安置办法》规定,



对来根据地之灾民，拥挤于被灾区域者，须有当地县政府协同救委会劝令转回原籍，与敌人进行斗争。豫晋区的干部哀叹：“然而我们也是自顾不暇，爱莫能助啊！”

要把饥肠辘辘的逃荒灾民遣返，谈何容易。有些村子做了一堆煎饼，然后以村为单位开个欢送会，往每个灾民手里塞两张煎饼“礼送”出境。灾民回去也是个死，就跟当地政府打起了“游击”，他们离开甲村却跑去乙村，呆着不走。

豫晋区对“欢送”难民回家工作不力十分不满，批评下面干部均存在着慈悲观点，没有从政治上了解这个问题。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1942年豫晋区工作检查总结》，《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太岳抗日根据地》P199）。1943年春荒严重时期，太行区被迫遣返灾民1万人。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指出1943年救灾中的种种弊病，“必须从实际行动中，体现生产观点，所谓‘生产自救’，不少地区还是停留在纸上或嘴上的口号，否则为什么坐吃山空现象相当不少呢？为什么流氓懒汉得到赈济，而血统农民（特别是贫农）得不到救济呢？为什么有些村干部贪污中饱，轻视劳动，形成抗战‘新贵’。而广大灾民却啼饥号

原本繁华的商业区遭废弃

1942年，即使没有灾荒，中国经济也已是破产了。而中西部更需以占全国四成的耕地养活占全国五成多的抗战区（沦陷区内迁逃亡民众达5000万人），用贫穷落后的中西部人力、财力支撑整个抗战。

贫呢？而且经过检查，这些现象并不是个别和偶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号召克服连续灾荒》，1943年7月24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一》，P321）

冀南区对灾荒亦出现估计不足、反应迟缓的问题。冀南根据地1942年变成游击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全部精力注意敌发展，对灾荒的危险没有足够警惕，指望用借粮和急赈的办法来解决人民的困难，没有从根本上生产备荒来解决问题。直到1943年7月之后，才将全部工作转入生产救灾，但已经形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一个根据地的成长——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史》，P170）所以冀南区成为了晋冀鲁豫四大区中饿死人和逃荒数最多的区域，全区死亡人数约20万—30万人，占总人数的6%，逃亡达100万人，占总人口的30%。（《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灾救灾工作论述》，陈刚著）

以“人祸”作结有失公允

用相关报道的话说，这场天灾实为“人

祸”，是因为“直到白修德的报道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迫于舆论压力，委员长才开始展开救援。但相对于大面积饥荒而言，赈灾粮食如同沧海一粟，更别提还要经过层层贪腐。”

先算一下这“沧海一粟”的经济账吧！

1942年，国民政府直接拨款加平糶基金，加上各种工赈和农业贷款，接近1.5亿元，这还不包括救灾期间金额庞大的各种民间捐款、各县自筹的1亿元多平糶基金、各种水利筑路等工程的雇佣劳力成本、粮食调拨的成本等等。跟政府拨款相关的金额起码近2亿元。

2亿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1942年，中国整个财政收入是52.68亿元左右，2亿元相当于1942年财政支出的3.8%。若以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计，乘以3.8%，就相当于2011年从财政支出里拿出近4000亿元救灾。抗战期间，每年军费支出占总支出逾半。这2亿元是从军费外开支里挤出来的，确已非常窘迫。

而当年的国民政府做的不止这些。比如1943年2月河南省政府还制定了保护农民土地办法，规定因灾荒而卖当之土地、房产，准五年内以原价赎回。政府将这次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对于救灾不力的甚至给予免职的处罚（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 1998年版，第312页）。

回顾这场在战况最艰难、财政最困顿年代的天灾，简单地以“这就是一场人祸”作结，显然有失公允。作为中国人民最深重的灾难之一，它值得被更认真地审视。而泡沫一般的“人祸”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同样值得探索的另一话题。

（黄道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元鹏、文亮系民间抗战史研究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天石对本文亦有帮助）

“农民们一直等待着这个时机。连续几个月以来，他们在灾荒和军队残忍的敲诈勒索之下，忍着痛苦的折磨。现在，他们不再忍受了。他们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时他们只是缴单个士兵的武器，最后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军队的武装。据估计，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械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军队能维持三个月，那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整个农村处于武装暴动的状态，抵抗毫无希望。三个星期内，日军就占领了他们的全部目标，通往南方的铁路也落入日军之手，三十万中国军队被歼灭了。日本为什么用六万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三十万中国军队？在于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

（摘自《温故1942》，刘震云）

豫灾与河南会战失利无关

围绕豫湘桂会战的真相与谣言

特约撰稿员 / 唐元鹏 黄道炫

“河南会战五万中国军队被农民缴械”，“六万日军歼灭三十万中国军队”，这是一个经常打着“以史为鉴”旗号被广为流传的段子。

附着在这些段子之上的结论通常是：

“由于中国政府在灾荒中把农民抛弃，丧失人心，农民也抛弃了政府，站到了日军一方。处于强弩之末的日军，1944年发起豫湘桂会战，由于腐败和丧失人心，国民党军队全线崩溃，一败涂地”。

这些说法和结论的始作俑者及鼓吹者是白修德、谢伟思等人。

不幸的是，这种说法与结论缺乏政治、军事常识，亦与事实不符。豫湘桂会战，中国军队的确作战失利，但它绝不是处于“强弩之末”的日军发起的一场战斗。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毛泽东也深感意外，他认为即便苏军进入东北作战，对日战争还得打至少一年。“强弩之末”是一种马后炮式的判断。

豫湘桂会战，日本总计动员军队51万人、1500门大炮、794辆坦克、10万匹马、1.5万辆汽车，为日本有史以来（非抗战以来）最大规模作战行动，超过日俄战争和武汉会战，所以日本命名为“一号作战”。

日军为了这次大赌博，可谓砸锅卖铁，不但调往南洋和东北的兵力叫停，还从关东军抽调27师团、军直部队以及大批后勤部队入关作战，并从国内动员大量补充兵充实一线兵团。

整个抗战中，少得可怜的美援主要用在了远征军和印缅战场，掌握美援的史迪威拒绝支持中国战场，中国国内军队获得美援换装，是在“一号作战”以后的事。

这次作战，日军面对的是一个抗战已七年的农业中国，半壁江山和精锐部队已失，政治、军事、经济处于疲竭状态。

中国军队的困苦状况

比如说第三战区，浙赣会战的194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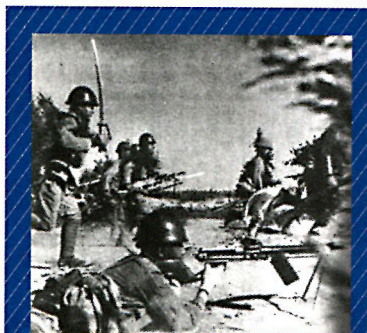


资料提供：维基百科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部队已属“精锐”之师，但他也头疼不已。据第三战区辖下的第105师组建师“精锐”先锋营的报告，全营共443人，每个步兵连100人有步枪50支，全营有轻机枪18挺、重机枪4挺、迫击炮2门，这已经是全师最精锐部队，其他部队装备状况更为可怜。

经过抗战将近5年的消耗，中国军队已经变得非常虚弱，一个师满编万人，现在普遍只有一半，每师平均所持步枪比抗战初期打了个六折，只有3000支左右，弹药的紧缺自不必说。

按照条例，作战士兵每人应该配发100到120发子弹，但顾的士兵如果能带50发已



正在进攻河南省的日军

豫湘桂会战，日方称为“一号作战”，日军总计动员军队51万人、1500门大炮、794辆坦克、10万匹马、1.5万辆汽车，为日本历史上最大规模作战行动。图为战斗中的日军。

属精锐部队待遇。看着手下有11个军33个师的兵力，实际上不过20万人，要面对日军从东西两头同时发动的进攻（浙赣会战），顾祝同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这场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战，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数百万人的厮杀，几千里战线的对峙，军火物资消耗之巨大，即便连工业化国家都难承受，何况一个农业国家。

到1942年为止，中国军队已在抗战中损耗了60多万支步枪，而通过自产及进口的步枪数量也是60余万支。看似损耗与补充相抵，但此时兵力从抗战初期的170万扩充到512万，也就是说增加了340万人，步枪却没有增加一支，并且大量的青壮劳力必须转化成非生产性人口。

日军士兵上战场，通常人均携弹量是120发，中国军队人若均能携弹20至50发，那已是相当好的弹药供给了。以中央军嫡系的36师为例，1937年7月有4876支步枪，但到了1942年只剩下2420支。而这一年中国只生产了1.4亿发子弹，但消耗量却是2.13亿发，全国储存的弹药只够全军打一次会战。

军火装备固然如此，士兵吃饭穿衣也成问题。

1941年黄仁宇22岁，那时仅是第14师一名排长而已，即使是嫡系中央军的排长，他也没有布鞋可穿，甚至没有袜子，只能光着脚穿草鞋，长途行军让脚上长出水泡，疼痛钻心。

许多时候，黄仁宇与士兵只能吃着坚硬如石块一般的玉米，通常要把这种粗玉米粒磨成粉，就着水勉强吞下去。他还要时刻紧盯自己的士兵，因为长期处于饥饿与营养不良之中的部下，会寻找一切机会到乡村里偷鸡摸狗。

让黄仁宇苦恼的还有，他和士兵们都只有一套军服，军政部拨的军服款项因为通货膨胀根本无法买齐全师所需的衣服。第

14师师长阙汉騫只能让军需官偷渡到日军占领的越南，买来白布自己染色再缝制成军服。为了节省布料，只能做成短衣短裤，于是黄仁宇可以脱下军服进行换洗了。

黄仁宇和他的兄弟们总算有了一长一短两套军服，但还有更离奇的故事。据军政部长何应钦汇报的状况，军中某部一套棉军装要分与三个人穿，怎样分的呢？得到棉大衣的，没有棉上衣和棉裤，穿棉上衣的光着腿，得到棉裤的只能光膀子。

中国军队这种困苦从何而来呢？

中国经济的破产

国与国之间的现代全面战争早已是“总体战”，完全是构筑在社会发展水平之上的综合国力较量和消耗，其胜负非熟读了《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的结果，军事水平主要依赖于工业化和组织化水平。

通过部分数据的简单对比，可以看出战前中日国力的差距有多大。

日本早在1911年，儿童入学率已达98%，中日战争爆发前，文盲率接近于零；中国战前7岁以上的乡村人口，仅有45.3%的男性和2%的女性接受过教育，男性文盲率69.3%，女性文盲率98.7%，北方地区的教育情况比南方地区还要糟糕

战前中国的工业和服务业产值占总产值的36.5%，日本占80.48%。作为军工水平重要指标的钢产量，日本为522.3万吨，中国仅有41.4万吨。

1937年，中国全国产值在1万元以上的工厂是3935家，工人总数45万多，日本则有10余万家工厂，工人290万，大致同一时期，美国拥有14万家工厂，600万工人。

日本仅有中国一个中等省份大，统一军政令后开启明治维新，推行富国强兵政策，跻身世界七强花了近40年，中日战争爆发前，现代化进程已走了近70年。

南京政府建立时，起初的有效管辖区

不过两三个省，逐步推行军政令统一，秘密进行对日作战经济、军事准备，虽卓有成效，到抗战爆发时，也不过十年，时间严重不足；而且军政令统一进程只完成一半，北方地区的政权与组织建设在日本干扰下始终未能顺利推行。

现代战争对钱财物资的消耗用“烧钱”都不足已形容，战争期间包括最富足的美国，军费开支比例都达到60%~80%。

战前英国有4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开战仅一年多，存款已耗光。作为老牌工业强国的大英帝国，拥有印、加、澳等广阔殖民地的支援，战时英国中产阶级家庭，早餐能有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已属奢侈享受；战后几年，普通家庭几星期才能吃上一顿肉。战争爆发后，英国本土仅遭到空袭，未被占领，但已精疲力竭，不得不拉下“前母国”之尊严，频繁向美国乞援。

1942年，中国工商业较发达的沿海地区，一半多产粮区，九成多产煤区早被日军占领。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中国的苏援已断，幸好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等来美援。

通过《租借法案》，二战中美国援助英国270亿美元，援助苏联113亿美元。中国在抗战结束前，从美国获得援助总额为6亿多美元，而且大部分没有用于国内战场。这点美援对中国而言，已经是雪中送炭，虽然全部用于国内抗战，亦不过像一桶水倒进池塘。

日军同样清楚这一点，中国只要获得外来援助，它就无法从“中国泥潭”抽身。获得外援需要有交通线，至1942年5月，日军把最后一条陆上交通线路滇缅公路切断，完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

此后，美国只能用飞机，把援华物资从印度一架架飞过喜马拉雅山运进中国，飞机的运力相当有限。1940年时滇缅公路每月运力为5000吨，使出吃奶的劲，几十架飞机九个月运量仅相当于当年公路一个月运量。



罗卓英与史迪威在印度检阅中国军人

1942年3月，中国仓促组建远征军，司令为罗卓英上将。为打通抗战“生命线”，也为获得美国军援，中国必须配合盟国对印缅作战。

运进的物资在满足了陈纳德的飞虎队之后，留给国内抗战的寥寥无几。

财赋盘子日益萎缩、贸易不通的同时，中国的军费开支越来越惊人，1937年军费占财政收入比重是170%，到了1942年比重达到198%。

1942年，中国财政总收入是56.29亿法币（其实相当于两三亿美元），总支出245.11亿，军费开支152亿多，赤字188.82亿，如果用正常年代的标准看，中国当时在经济上已破产了。同时中国要用占全国4成的耕地，养活占全国5成多的抗战区（沦陷区内迁逃亡民众达5000万人），用贫穷落后的中西部人力、财力支撑整个抗战。

自1940年之后，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每月发薪的时候就特别愁苦，手里捏着2000元法币回家，却不知道够不够买米养活家人。这个月薪在抗战初期能牵40头牛回家，开个养牛场，到了这时，这点钱只够一家半月之用。梅校长上有双亲，下有四个子女等

着吃饭，家里经常有揭不开锅的时候，偶尔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孩子们高兴得像过年一样。为了帮补家里的生计，梅大教授的夫人韩咏华做起了小买卖，做了切糕挎着篮子到大街上贩卖。为了不给丈夫丢脸，梅夫人悄悄换上蓝布褂子，自称姓韩不敢提夫姓。后来事迹传开，梅夫人干脆把糕点命名为“定胜糕”。

抗战前学者们属高薪阶层，过着优裕的生活，此时却潦倒至此，普通百姓的日子可想而知。

战争带来的通货膨胀使1942年物价已飞上天。1941年11月，太平洋战争前夕，中国辖区物价指数是1898，仅半年后的1942年6月，最后一条陆上交通线滇缅公路被切断时，物价指数翻到3750，涨了一倍。1943年，当外援纯粹由飞机运输后，物价翻倍速度已到了令人欲哭无泪的地步。

中国就在这样的困苦中走入了第五个年头，到1944年豫湘桂会战前第七个年头，

前述状况只会进一步恶化。

1942年，实际上最重大的问题是“抗战存亡”，可汲取来支撑抗战的资源唯有农业，唯一选择的办法就是——“征税征粮”。

粮食三征是保存抗战命脉的办法

如果中国不效法欧洲国家实行“战时统制经济”——即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战略产业收归国有，由国家集中调配资源来支撑战争，中国的抗战连四年都撑不住。

战前中国税收主要是海关、盐税和统税三种，占税收总额92%。但开战后沿海相继失陷，关税和盐税收入锐减。除了广泛设立税收项目外，当时只得对粮食实行“征购、征借、征实”三征政策，以粮食为杠杆作为调剂手段，维持庞大的开支。

战时经济政策从来都只利于战争，不利于民生。英国二战中，对收入达某个指标的阶层，个人所得税率最高征到98%，工薪阶层所得税率也在30%多以上。要么亡国，要么征税征粮，可以说各国皆别无选择。

1941年7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了一道法令《战时各省田赋征收实物暂行通则》，全国征粮2300万石。一年之后，定额增加到3000万石。当时全国军警公务员约有1500万人，共需粮食7500万石，田赋征实数连所需的一半都不到。于是又采取向大户定价征购余粮的办法，对所征购额三成平价付现，七成发给粮食库券，等于七成先打白条。值得提醒的是，征实是指把交纳的田赋从货币形式改为用粮食来缴纳，并不是指田赋外加征，征购和征借是要归还的。

从1941年到抗战胜利，通过“粮食三征”，获粮2.45亿石。每年征来的粮食有50%~80%拨为军粮。这笔巨额粮草还帮助解决了公务员薪水，一定程度抑制了抗战区物价，当然还包括在1942~1943年向中原灾区进行赈济。

可以说，在战争条件下，解决国家财政经济困难，保证军粮民用供应，田赋改征实物是最可靠、最有利，也没有选择余地的财政措施，具有战略意义。

谣传河南灾荒中粮食三征加剧了军民关系紧张，导致后来民众对溃军的袭击、缴械。之所以这样想，因为人们认为军粮征收必然影响到军民关系，这里有认知误区。

田赋征实后，按照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回忆，最大的成效就是避免了军队与民众的直接冲突。部队粮食供应，由中央向各省规定每年应征粮的总数，各省主席再将征粮数摊派到属下各县，然后保长告诉民众把应缴粮食送到县政府，由县府报给行政专员，后者依次呈报省政府，省政府交给军队一张全省各县的征粮统计单，军方将食米定量分派给军级单位。

军粮供应由军队和地方政府接洽，军队原则上不再和民众直接发生关系。当然，部队调动以及军粮供应短缺时，扰民状况不是完全没有，但制度设计大体避免了这种状况的普遍出现。

其实，当时河南民众更普遍感觉不满的是军纪和对民夫的过度征用问题，粮食问题应该不是冲突的主要原因。

豫湘桂会战溃败的真相与谣言

1944年，在盟国这边，中美积极推进缅甸战役，希望打通滇缅公路，对于经济崩溃的中国来说，这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一年发生在中国的两场大战，有相同之处，中美与日军不约而同地把战略重点放在交通线上。

中日双方都在战术上达到了目的，中国军队赢得缅甸战场而丢失国内战场。

面对日本“一号作战”的中国，由于美援卡在史迪威手中，为了获得这点可怜的外援，中国必须配合盟国对印缅作战，而史迪威只重视英缅战场，可使自己建功立业，置中国方面对日军可能发起大规模进攻之警告不顾，将美援用在了国外战场和远征军身上。事后，史迪威把一切责任全推到中国身上。

“一号作战”前，中国军队为了打通滇缅公路，驻印军、远征军两支国内最强大的军团共14个军41个师的兵力还部署在滇缅方向。

根据中日两国的国力和两军装备、训练的巨大差距，抗战中，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至少需要有5:1的兵力配置，这绝不是靠英勇能解决的问题，大部分中国军人是死于日军的优势火力之下。举个例子，抗战之初经过数年训练、全国装备最精锐的第36、87、88三个德制师3万人，仍然无法将上海4000日军海军陆战队消灭。

八路军的装备较差，对兵力的部署要



中国士兵接受西方军事观察员检阅

1942年，经过抗战近5年的消耗，中国军队已经变得非常虚弱，不仅缺乏装备弹药，而且衣衫褴褛，食不果腹。

求则更高，且无力对日进行阵地战和运动战，只能采用游击战术。1940年10月底，著名的太行山区的关家垸战斗，彭德怀指挥八路军129师主力8个团加总部炮团一部约1万人，进攻日军冈崎支队500余人，激战两个昼夜。八路军付出约2000伤亡的代价亦未能全歼日军，日军阵亡52人，总伤亡151人。

这是一场国力严重不对称的战争，中国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口多，地盘大，所以当年中国凡有见识的政治、军事人物都认为中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中国的战略是以空间换时间，苦苦支撑等待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用国民党左派将领张发奎的话来说，抗战期间日军想占领哪里就能占领哪里，没有占领的地方是它还没想去占。这话听起来逆耳，但基本符合常识与事实。

参考另一组数据，可以得出更客观的印象。

苏联红军曾是中国过去长期赞赏和效仿的对象，中日之间的差距远远大过苏德之间的差距，苏联二战中的国力总数字在世界居于前列，但工业化、组织化质量和军事素养低于西方。

经过斯大林数年的经济、军事准备，国

家战略纯为军事而服务，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大兵工厂。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仅部署在西线的坦克有1.4万辆、飞机1.1万架、大炮6万门，兵力400余万，皆是德军部署在东线的数倍。苏联战时是获得英美援助第二多的国家，若无这些外援，苏联的很多飞机、坦克、枪炮生产不出来，生产出来也因缺乏燃料和弹药而成为废铁。

然而苏德战争的结果是，苏军伤亡2600多万，被俘630万，德军伤亡260余万，被俘95万；苏军与德军作战的伤亡比例通常在10:1左右。

1944年豫湘桂会战的河南战场，中国军队与日军的兵力配备是28万对14万，为2:1，不是报告文学谣传的6万歼灭30万。湖南战场，中日兵力配备是30万对30万，为1:1。1944年时，双方不仅在装备、训练、物资上的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而且在兵力对比上，中国还处于劣势。

即使在此不利局面下，中国军队的第10军还在衡阳坚持了47天，延缓了日军的战略目的。整个“一号作战”，日军伤亡病死达到5万人，占总动员人数的1/10。

1945年1月滇缅公路重开，到抗战胜利前半年之间就给中国运来了20多万吨物资，这些物资支撑中国最终走向胜利。不过要注意，这是“一号作战”以后的事。

关于河南会战，有个“5万中国军队被河南农民用木头棍棒缴械”的传说，结论是由于中国当地驻军纪律败坏，腐败无能导致民变。这不仅是编造出来的谣言，且严重违背常识：无组织的农民哪来的能力大规模缴除正规军武器？

河南自清末民初以来就是土匪横行，民间枪支泛滥的省份，豫西一带还有著名的土匪“刀客蹚将”，河南流传的四大祸——

“水、旱、蝗、蹚”，后来被别有用心地编排置换成了“水旱蝗汤”。

随着日军的进攻，中国军队败退过程中，各地出现真空，治安混乱，趁火打劫的正是这些土匪武装。这些土匪武装不仅曾攻击过中共的红军，后来也攻击过解放军。

这个谣言主要针对汤恩伯的主力部队13军，甚至还谣传汤恩伯的电台被收缴，本人化装成伙夫才逃脱。实际上汤的部队只遭到轻微袭击，在谣传遇袭的那个时间段，他在洛阳第一战区长官部开会，从未遇袭。蒋鼎文的部队倒几乎都遭到土匪武装攻击，而蒋的有些部队是从其他战区调过来的，以前未在此地驻扎过。

河南会战中趁乱为祸最甚的是上官子平的土匪武装，他后来被八路军降服，收编为独立第一旅。上官子平在1945年5月又叛变，杀害了100多中共党政军干部。

中共“豫西抗日先遣支队”的张清杰也在其回忆文章中提到，“据当地群众说，那是温村镇，镇里有个司令叫乔明礼，手下有3000多条枪，还有几门迫击炮，周围二三十里内都是他的地盘。那些人一见枪眼就红了，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就被他们收拾了很多，建议我们不要从那里通过。”

白修德：新闻与幻象

美式“报告文学”记者创造的史学模式

特约撰稿员 / 许敬

1942年5月20日，史迪威率领100多人，从缅甸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中辗转20余日，落荒逃到印度英帕尔，他们面容倦顿，疲惫不堪。

当时美国刚全面介入二战数月，举国还陷于珍珠港事件的梦魇中。日军轰炸珍珠港后，动员13万兵力发起了对菲律宾15万美军的进攻，美军作战失利，10万人被俘。

美国媒体此时太需要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了。随同史迪威逃出来的一行人向媒体不断讲述他们的脱险经历，如“每分钟105步的行军速度”。很快，史迪威被媒体塑造成老而弥坚，即便陷入惨败也能力挽狂澜，富有冒险精神的美国英雄。

在史迪威光芒万丈的时候，很多人却忘了，作为中印缅战区的参谋长（最高司令是蒋介石）、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官，他由于从未有过统兵经验、判断失误、指挥失利，使远征军陷入日军包围，他甩下10万中国官兵，带着一小撮人只身脱逃，责任在哪？

截至8月初，出发时的10万大军仅剩4万人，如第200师一路北撤突围，至6月中旬才回到中国，部队减损失一半，少将师长戴安澜伤重殉国。

“我们居然跟一个愚昧无知的农民的狗杂种（指蒋介石）结盟”，当年8月，史迪威跟《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初次见面时，即对战场失利做出这样的总结。

此后白修德与史迪威结下了深厚私交，史迪威是他心目中最完美的偶像，两人对中国一切问题都找到了“共识”，即这场战争任何失误都与蒋有关，是他“拜占庭阴谋模式”造成的。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白修德作为半路人



汤恩伯与白修德

白修德曾在国宣处和中统工作过，因有这层身份，采访与交友十分便利，交识了众多大员和名流。

行的政治记者，最大成倒不是河南灾荒的社会报道，而是他和史迪威共同缔造了一个对中外政治、学术影响深远的史学模式，说它对改写东亚历史进程起到重要作用亦无夸张之嫌。

白修德与“酸醋乔”的友谊

史迪威由马歇尔提拔上来，这个背景加上他的乖戾个性，与同僚们无法相处。他给蒋取的外号是“花生米”，就罗斯福的残疾特征，他取了个外号“橡皮腿”，与陈纳德将军的关系势同水火，和英国的东南亚最高指挥官蒙马顿互怀敌意，对后来接任他位置的魏德迈将军竭尽贬损。

由于性格刚愎自用，尖酸刻薄，他也得到了一个外号——“酸醋乔”（史迪威全名为 Joseph Warren Stilwell）。

他指挥第一次远征军作战失利，只身脱

夸张，是真理的外衣。

——白修德（引自《白修德传》，乔伊斯·霍夫曼）

逃，不仅谎报情况，把所有责任推卸干净。蒋提醒他，如无重型武器或空军配合，勿轻易发动进攻，这些被他视为“怯懦与畏战”。

白修德的观念深受史迪威影响，曾描述说，美国的盟国们都是令人灰心丧气的，专门利用美国宽宏大量的美德，这其中蒋最贪婪，因为他总是向史迪威要枪炮、飞机、汽油（史迪威手中握着美国支援中国的军援物资）。美国二战的援外战略本来就是重欧轻亚，而史迪威认为，美国对盟国的援助中，中国应该排序到最后。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量的美国记者、撰稿人、外交官涌入中国。按照头号发达国家的标准来看，和平时期的农业中国都有诸多缺失；他们涌入中国时，抗战已进入第五个年头，一个疲惫困顿、经济破产、军事艰难的中国展现在他们眼前。此前中国如何抗战，物资人力消耗困苦到何种程度，中日之间的工业和军事水平差距等背景知识，他们很多人缺乏了解，也可能没多大兴趣关注。

对中国来讲，入缅作战，既是要尽盟国义务、协助英国，也是为了打通滇缅交通线，最终目的是为了国内抗日战场，只有如此才能获得美国军援；于英国来讲，希望获得中国军队协助它打击日军保障殖民地利益；于史迪威而言，印缅战场是个人建功立业的机会。

各方由于目的不同，合作中充满龃龉。

第一次作战失利，史迪威于1942年6月从印度回到重庆，同时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他并不关心中国战场，并未投入多大精力筹组中国战区的参谋指挥体系，他朝思梦



1942年，史迪威（左二）视察一个在华美裔职业培训学校。

想的就是如何调用中国军队，使用美国军援中国的物资用于印缅“雪耻”。如果中国不满足他的要求，他动不动拿美国援华物资来要挟，这更加深了他与蒋的矛盾。

当然也因此，远征军自此得到了美国军援，开始换装（1942年第一次远征军入缅作战未得美国军援，仍用旧武器）。

1944年日军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豫湘桂会战中，国内战场几乎没得到美国军援，甚至还抽调主力部队到滇缅。

史迪威战前中方多次关于日军可能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警告于不顾，视其为“胆小”的表现。在湖南战场的衡阳战役时，日军进展不利，中国军队希望得到美国物资，以便反攻，史迪威拒绝了哪怕拨出区区1000吨物资支援中国战场时，竟然还扔出了一句“让他们上火去吧”。

陈纳德后来给罗斯福发的电报说，因为把主力军集中投入缅甸，导致中国战场上大片领土的沦陷。所以当时有人揶揄史迪威是“最好的四星营长”。

1945年1月，滇缅公路终于打通，但中国为此在国内战场付出更惨重的代价，月底才告建成公路开通也已经为时已晚，且路况不佳，运输量也有限。陈纳德将军曾经希望

美军加大“驼峰空运”的数量，史迪威由于虚荣心所驱使，给予阻挠。

史迪威在中国和英美军事同僚中处于“孤立”状态，唯有白修德等几位记者（还有外交官谢伟思）频频给他送来温暖。他想获得中国军队的全部指挥权，视蒋为他建功立业的绊脚石，而这个又触犯蒋民族主义情绪，两人矛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罗斯福随后将他撤换，史迪威从此成为一个针对蒋和国民政府猛烈抨击者。

“白费史”史学模式的诞生

白修德等人对史迪威的去职充满了悲情，1946年史迪威去世后，白修德于1948年编辑出版《史迪威文件》，一时成为畅销书。从此，一个伟大、光荣、正确，与各种错误与恶势力斗争的英雄史迪威形象被塑造出来。

白修德和史迪威的观点不仅影响了新闻界同行、美国外交界，还影响了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学界，此后很多涉及民国史研究的美国著作必然参照和接受史迪威与白修德的材料、观点，尤其费正清等汉学家再

经过学术包装，携着美国的强势地位行销于世，形成一个“白修德—费正清—史迪威”史学模式。

“白费史”还影响了美国的东亚外交政策。加上当时一个特殊原因——即美国政府、学界、新闻界、军事情报部门被大量苏联间谍渗透（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苏联部分档案，美国维诺那档案解禁而揭露出实情，且仅是冰山一角），如罗斯福的首席行政助理柯里、财政部次长怀特皆为苏联间谍。

费正清曾担任过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处长，隶属于“太平洋学会”，这个学会是苏联渗透美国的一个战略性谍报（统战）组织。

太平洋学会的创始人卡特尔、核心领导范弗比尔特不仅推崇苏联制度，崇拜斯大林，为“大清洗”辩护，甚至希望美国早晚走上苏式道路，他们向美国外交系统，尤其是远东地区推荐了大量的外交官，也向中国推荐过不少顾问。

两面一起诱导下，致使美国的错误外交政策形成“蝴蝶效应”，从雅尔塔协议、对华政策、朝鲜战争到印度支那战争，始终处于被动状态，一败再败，导致美国在冷战中付出8万亿美元的代价。

“白费史”模式的美国著作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大量涌入中国，再被中国的知识界进行加工与传播，写入各种各样作品中，影响深远。典型的有易劳逸、邹谠、齐锡生等学者的各类著作（齐锡生近年已放弃该模式）。

有趣的是，“白费史”模式的内核与苏联官方的史观相似，但它又披着“自由主义”外衣，有着好莱坞式和哈佛式的包装，契合了很多批判体制的知识分子的诉求，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中影响甚巨。于是，它倒成为左右派皆全盘接受的史观。

抛开政治背景不说，“白费史”模式的

白修德集各种矛盾的意识形态和言行于一身，但是在关键的利益关头，他往往会妥协。

报道与著作，具有严重的知识结构缺陷，其大量结论与表述经不起事实与逻辑检验。近年西方学界已经逐步将之推翻，费正清临去世前也写了一本书将此前自己的很多观点推倒。不过在中国，这一模式的影响仍是主流。

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文艺青年

1915年5月，白修德出生于美国波士顿，他的父亲维拉迪夫斯基是俄国犹太人，为逃避兵役移民到美国。

白修德的母亲是虔诚的犹太教徒，父亲则是位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痛恨美国的政治制度，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皆垃圾”，打小就对白修德灌输他的理念。

靠着奖学金和慈善资助，他终于如愿以偿进入哈佛大学历史系，投身于汉学家费正清门下。不过他终究没有成为波士顿的历史学者。费正清与美国记者斯诺熟识，认为白修德具有跟斯诺相似的气质，在费的劝说下，白修德投身于新闻行业。

带着老师赠送的二手打字机、六封推荐信和殷切的期望，也带着刚获得的1500美元的旅行奖学金，白修德开始了他的环球之旅。

奇异的成长经历和贫困的生存环境，造成白修德几乎是贯穿终身的意识形态矛盾。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又是“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他又是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旧欧洲”有着深恶痛绝的排斥，他对童年时代的美国，也有着黑暗的描述。他又会在不同阶段根据自己的利益调整话语，哪怕有违自己的意识形态。

白修德还有着文艺青年惯有的煽情与感性，并把它作为解读各种问题的工具。1938年10月白修德到达伦敦，11月到达巴黎，在这里，他对欧洲人发出了切齿的怒吼：“他们卑鄙野蛮，坏到骨子里头，我以自己所有的热血和气概仇恨他们！”直到二战结

束，他还是保持着这种意识形态的固执。

环球旅行时，他还有一份和《波士顿环球报》签订的合作协议——在旅行途中给报社发稿，一经采用即付给相应的稿酬。在中东时候，他刊发了处女作，描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冲突。

这篇媒体处女作带着今后贯穿白氏作品的很多特征——充满着文学激情和立场阐述，爱就极赞，恨就极贬，奠定了他“幻象新闻写作”的风格。他得到了八美元的稿费，白修德于是自封为“环球报远东通讯员”。

但这种薪酬不确定的工作不能给白带来心理上的稳定。在从埃及开往中国的邮轮中，他做了自我剖析，在“有道德的生活”和“不择手段赚钱”之间犹豫不决。最后，他决定，“我想过舒适的生活”。

因此，1939年3月到达香港后，他还是选了一份能够带来65美元月薪的长期工作——进入重庆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担任国际新闻的采编审核工作。

白修德工作的国际宣传处在抗战爆发时隶属于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五部，后改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接受副部长董显光垂直领导，而董氏又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直接负责，无需经过军委会或国民党中央的转达。这个国宣处后来成为行政院新闻局的前身。

当时中国在军事上单独对抗强敌超过两年半之久，困顿之象已显露，急需友邦及其人民、社团的鼎力支持。加强国宣处，无论外交、舆论、经济、军事，都有可能给艰难的抗战带来帮助。

白修德虽然当时只有24岁，却也非常善于寻找事业发展的机会。认真工作的同时，利用自己官方工作人员的身份和外国媒体驻重庆办事处广泛沟通，既得到了友谊和信任，也获取了许多内部消息——他毕竟还有个“远东通讯员”的兼职。为了多赚点钱而过上“舒适的生活”，他除了给《环球报》发

送报道外，还一稿多投，略加改写后分别给英国、澳大利亚等多国媒体投寄，获取更多稿费。

谋职于时代周刊

1939年5月，白修德因接洽《时代》周刊老板卢斯访华，深得对方满意，幸运地谋到一份兼职——《时代》周刊的驻华通讯员，不受薪，按稿费计报酬。从此他正式踏入媒体圈，直至终老。在这个圈子中，尤其是在重庆的那么多年里，他结交了很多好友，老板卢斯甚至在某一阶段也和他称兄道弟。

此时的白修德还不是《时代》的正式员工。为了更上一层楼，他必须拿出更好的报道。因此，在1939年夏天，他进入了中国新疆，进行为期五周的游历。他观察到苏联势力已经严重渗透，“莫斯科控制了这里的矿产资源”。似乎中方认为他这篇报道有可能破坏当时结盟的中苏关系，未能发表出来。白修德写信向费正清诉苦道：“今天的中国承担不起因为刊登有关苏联在中国的立场问题而失去苏联援助的后果。”他不得不对此保持沉默。

白修德不甘于此。9月，他去了中国北方腹地的山西，那里是犬牙交错的抗战前线，其中必有很多故事值得他去报道。利用身为国民党新闻官员的特权，白修德很快拿到了通行证，走上了北上的漫漫长路。

这次考察他用时更久，主要考察了阳城、晋城、高平这三个县，并深入中共抗日游击队了解详情。他对这三个县的新任县长大表赞叹，因为他们年轻，只有二十五六岁，又都分别在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受过高等教育。

白修德笔下描述了一个中共抗日游击队的“吴队长”。他报道说，这位队长更注重意识形态的区别，在队长眼中，日本侵略者、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和“托派”——白修德费了好大的劲才明白这个词指的是当时中国

罕见的托洛茨基分子——同样的可恶。并且“吴队长”自豪地告诉白修德，他的队伍中新近还处决了一名“托派”分子，令白觉得“不易理解”。

由于《时代》老板卢斯推崇蒋介石，憎恶日本，支持中国。白修德这一时期的报道似乎迎合老板的口味，多抨击日本，赞扬蒋和中国。白修德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有次他经过一个被日军“扫荡”过的村庄，然后就用夸张与虚构的笔法描述了惨状。

在为国宣处服务时，他向外国记者提供了一位虚构的“抗日女游击队长蔡金花”的故事，还给了这位“蔡金花”的照片——一个身穿军装，腰插两支手枪的年轻妇女的形象就此登上了海外各大报刊的版面——这些报纸的编辑们全然不知，这照片是白修德伪造的。

著名的美国女作家项美丽 (Emily Hahn) 是《纽约客》杂志的资深撰稿人，也是白修德在重庆时期的老朋友，她在回忆录中也温和批评白修德的报道风格，认为他“太着重表达他想看到的，而不是他实际见到的”。

1941年5月，卢斯来中国访问时对白修德进行了当面考察，最后决定，白有资格成为《时代》正式员工，但不适合做一线调查记者，于是卢斯回国时把白修德带回了纽约，让他在洛克菲勒中心二十九层的周刊总部担任编辑工作。

“反共产主义者”

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正式结盟，驻重庆的记者骤然增加，白修德作为经验老道的“中国通”，重新成为了《时代》周刊的驻华记者。

1942年8月，在印度采访了史迪威以后，他来到了那个久违的中国抗战之都——重庆，从此以后，他深深迷恋上了史迪威。从这时候开始，他卷入复杂的地缘政治、中国



内政和个人矛盾的纠葛中，完全跟随史迪威口径来评说报道人物与事件。不过他的很多稿件被老板卢斯认为偏颇和失实太严重，而常被勒令删改了才发表。

到1944年10月，史迪威被解职后，白修德对中国政治报道的态度完全被幻象所替代，态度越来越激进。这致使他和中国当局的关系恶化，尤其其他关于苏联、中共的报道与观点，使老板卢斯、编辑钱伯斯对之日益不满。

白修德还与中国新闻界名人发生龃龉，时任路透社重庆分社主任的赵敏恒撰文指责，说很多外媒驻华记者是“嫖客、酒鬼和蠢材”，而白修德更是出格，“报销单上做手脚已经发财致富”。白氏听说后大为愤怒，却不敢去法院提告，此事遂不了了之。

他的编辑钱伯斯曾经是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间谍，美共秘密党员，30年代末斯大林的大清洗使其认识的很多朋友“失踪”，出于恐惧和对内情的了解，政治态度发生了大逆转，变成一名坚定的反苏分子，举报了大量潜伏在美国的苏联间谍。

有鉴于此，1944年8月卢斯安排钱伯斯为国际版总编辑，要求他对白修德的中国报道严格把关，白修德为此发起驱逐钱伯斯的风波。白修德曾向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提出

政治建议，结果引起赫尔利的惊吓和愤怒，半个月后还痛骂白修德“不是美国人”，而是“该死的煽风点火的狗崽子”。

1946年，与自己的情人贾安娜写完畅销书《中国的惊雷》后，白修德销假回到了《时代》周刊，要求卢斯派他去莫斯科任职，被拒绝后便递交了辞呈。在这封辞职书中，白修德说，他和卢斯关于中国问题的分歧，“应由历史来决定”。

白修德此时已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内部档案认定为“一名支持苏联的作家”，和“一名共产主义的同情者、追随者”，最严重的时期还被吊销了出国护照。

不过白修德的转变也非常快，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又变成了一个美国强硬政策的支持者，美国制度的热情拥护者，并声称自己是一个“反共产主义者”，赞同美国在东南亚主动出击。

1970年代出版的自传中，白修德说，自己当年对延安和中共的描述，其实都是对方安排给他看的假象，而他心中一直是明白的。这等于他把自己从前的新闻报道、职业操守给否定掉了。

他还有优秀的文学创造能力，在其职业生涯里，他既写新闻报道，也常写小说，他的纪实作品和文学作品之间的界限相当不清晰。

1960年代白修德在美国创作出“美国总统诞生”的系列政治“内幕报道”畅销书，并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这些故事场面宏大，内容详尽，充满戏剧性，塑造了一个光辉伟大、神圣崇高的肯尼迪形象，并对肯尼迪的当选产生了影响。

白修德的传记作者乔伊斯·霍夫曼指出，他的一生总是用意识形态代替职业的客观性，有意识地制造神话。他的笔下既有完美无瑕的英雄，也有十恶不赦的魔鬼。